

達摩大師來華時間析論

——胡適先生「劉宋來華說」的再確認

羅鈴沛*

提 要

達摩大師 (Master Dharma) 被認為是中國禪宗初祖，因此，凡是要進入禪宗思想之門的人，首先都必須認識這一位把印度大乘禪學傳入中國的大師。但是，在近代學術研究的檢驗之下，經過學者們的努力，也只能肯定歷史上確有菩提達摩其人而已，至於其他傳說都不甚可靠。光是有關達摩來華的時間討論，學界就有不同意見，本文討論了主要的四種說法：一、梁普通七年（526）來華說，二、梁普通八年（527）來華說，三、梁普通元年（520）來華說，四、劉宋（479）以前來華說。針對這四種說法，我整理了學界的不同意見，認為普通七年和八年來華說所根據的資料，只能作為達摩來華時間的下限，並不能確定他就是普通七年或八年來華。普通元年來華說的證據都屬於比較後期的資料，早期的史籍並沒有記載，因此，可信度不足。最為可靠的是胡適先生提出來的劉宋以前來華說，他所根據的資料是《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初達宋境南越」一語，以及僧副師事達摩的記載。但是，僧副師事達摩的記載遭到學界質疑，認為僧副師事的達摩不是菩提達摩 (Bodhi Dharma)，而是達摩提婆 (Dharma Deva)，讓胡適的論證只剩下「初達宋境南越」一條孤證。我根據早期史料《續高僧傳》論證了僧副的禪學老師確實是菩提達摩，而不是達摩提婆，讓達摩大師「劉宋以前來華說」得到了更有力的證明。

*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109 年 8 月 26 日 接受刊登日期：110 年 5 月 28 日。

關鍵詞：禪宗史、僧傳、菩提達摩、來華、胡適



一、前言

菩提達摩對於中國禪宗影響深遠，被奉為禪宗初祖。然而，在近代學術的檢視中，菩提達摩卻成了撲朔迷離的人物，甚至有人疑達摩為「無是公」、「烏有先生」一流的人。¹胡適先生晚年從事了一系列的禪宗史的研究，在他辨偽稽古的考證下，也僅僅能承認達摩確實是一個歷史人物而已。²由於敦煌新發現的史料，加上與胡適先生的互相激盪，日本學界也對禪宗初期發展史有了更多的考證。其中有關達摩大師的研究，關口真大就先後出版了《達磨の研究》和《達摩大師の研究》兩本專著。³前者是有關達摩大師生平考證的著作，後者就是有關達摩論的專著。關口真大比對了歷代史料傳記，最後結論認為：歷史上的確曾經存在菩提達摩此人，他授予慧可四卷《楞伽經心要》，除此之外，有關菩提達摩與梁武帝會面、問答，一葉渡江、六度被毒、隻履西歸等等，全部都是虛構、捏造。⁴經過學界前輩的努力考證之後，雖然可以確定歷史上確實有菩提達摩其人，但是，圍繞著達摩大師的生平事蹟仍然存在著很多疑問。第一個問題就是：達摩大師到底是什麼時間來華的呢？這就已經眾說紛紜了，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說法：一、梁普通七年（526）來華說。二、梁普通八年（527）來華說。三、梁普通元年（520）說，四、劉宋（479）以前來華說。因為來華時間又與達摩是否曾經晉見梁武帝的傳說相關，因此，禪宗初祖的來華時間，便成了近代禪宗史研究的重點議題之一。本文將整理、分析各家觀點，試圖釐清這個問題的一些疑點，並就教於大方之家。

二、達摩大師的傳記資料

有關達摩大師的傳記資料可謂汗牛充棟，時代越後出的，往往增益的傳說就越繁複、越具神話色彩，因此，傳記史料的時代先後，往往成為後世討論達摩傳說真偽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所以，在分析考察達摩大師來華時間之前，有必要對達摩大師傳記的時代先後，作一些交代。以下根據關口真大：《達磨の研究》、

¹ 胡適著：〈菩提達摩考〉，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6月），頁53。

² 胡適著：〈菩提達摩考〉，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頁53。

³ 關口真大著：《達磨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昭和43年（1968年）），《達摩大師の研究》（東京：春秋社，昭和44年（1969年）不著月份）。

⁴ 關口真大著：《達磨の研究》，頁232。

曲大成：〈菩提達摩生平研究〉，列出十多種有關達摩大師的重要史傳資料⁵，作為後續討論的依據，除非有需要特別討論的地方，不再逐一標註。

(1)〔北魏〕曇林：《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及序》，約撰於六世紀初。

(2)〔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成書於 547 年。

(3)〔唐〕道宣：《續高僧傳》，成書於 667 年。

(4)〔唐〕淨覺：《楞伽師資記》，約成書於 712-732 年間。

(5)〔唐〕杜朏：《傳法寶紀》，成書於 716-732 年之間。

(6)〔唐〕神會講，獨孤沛集：《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約成書於 745-760 年間。⁶

(7)〔唐〕神會講，劉澄集：《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成書約在 792 年之前。⁷

(8)〔唐〕撰者不詳：《曆代法寶記》，約成書於 774 年。

(9)〔唐〕慧能講，法海集：《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以下簡稱《壇經》，敦煌本一般認為是最早的《壇經》，成書可能在 732-800 年之間。⁸

(10)〔唐〕智炬：《寶林傳》，成書於 801 年。⁹

(11)〔日本〕最澄：《內證佛法血脈譜》，成書於 819 年。

(12)〔唐〕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成書約在 780-841 年之間。

(13)〔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成書約在 838-841 年之間。

(14)〔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鈔》，成書約在 823-841 年之間。

(15)〔南唐〕靜、筠二禪師：《祖堂集》，成書於 953 年。

(16)〔宋〕釋贊寧：《宋高僧傳》，成書於 996 年。

(17)〔宋〕道原：《景德傳燈錄》，成書於 1004 年。

(18)〔宋〕契嵩：《傳法正宗記》，成書於 1061 年。

《傳法正宗記》以後，尚有《天聖廣燈錄》（1029 或 1036）、《建中靖國續燈錄》（1101）、《祖庭事苑》（1108）、《隆興佛教編年通論》（1164）、《聯燈會要》（1183）、《嘉泰普燈錄》（1204）、《釋門正統》（1237）、《大光明藏》（1265）、《五燈會元》

⁵ 關口真大著：《達磨の研究》，頁 50-51。曲大成：〈菩提達摩生平研究〉，《正觀》第 7 期（1998 年 12 月），頁 7-62。

⁶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記錄了神會於開元二十年（732）假滑臺大雲寺名開的辯論大會中的公開論辯，由神會的弟子獨孤沛於 745 年前後集成，現存本為神會晚年（760 年）前後改定。參考陳盛港：〈再論獨孤沛之〈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7 期（2002 年 7 月），頁 115-146。

⁷ 參考張國一著：《唐代禪宗心性思想》（臺北：法鼓山文教基金會，2004 年 4 月），頁 88。

⁸ 參考胡適著：〈壇經考〉，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頁 295。印順著：《中國禪宗史》（臺北：正聞出版社，1975 年 2 月），頁 272。楊曾文著：〈《六祖壇經》諸本的演變和慧能的禪法思想〉，《中國文化》第 6 期（1992 年 6 月），頁 24-37。

⁹ 〔唐〕智炬著：《寶林傳》，收於柳田聖山主編：《禪學叢書》之五（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 年不著月份，據宋藏貴珍影印）。

(1252)、《五家正宗贊》(1254)、《佛祖統紀》(1269)、《釋氏通鑒》(1270)、《歷朝釋氏資鑑》(1275)、《佛祖歷代通載》(1341)、《釋氏稽古略》(1354)、《六學僧傳》(1366)、《神僧傳》(1417)等等。¹⁰總之，《傳法正宗記》之後，在中國和日本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傳燈錄類的達摩祖師傳，大致都是祖述《傳法正宗記》的達摩祖師傳而有所節略而已，因此，《傳法正宗記》可以說是現存達摩傳的完成和基準。¹¹

三、達摩大師來華時間之一：

梁普通七年(526)來華說

古籍中主張達摩來華時間在梁普通七年的，最先是《五燈會元》：

(達摩)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¹²

《五燈會元》成書於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因襲其說的古籍有明弘治二年(1489)成書的《禪宗正脈》，明萬曆二十九年(1602)的《指月錄》、清雍正十一年(1733)選編的《御選語錄》等。由於《五燈會元》的成書年代，與達摩的活動年代已相距 700 多年，且未列舉證據，實在難以考證。不過，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則認為「普通七年來華說」頗為合理，他在其《中國禪學思想史》中，列舉了四點理由：

- 1、根據《傳燈錄》、《傳法正宗記》所傳，達摩曾在少林寺凝住壁觀九年，因此，達摩之渡來應在少林寺建立之後，少林寺之建立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所以達摩東來應在 497 年之後。
- 2、達摩滅後還西天與魏使宋雲遇於蔥嶺的傳說，此傳說代表達摩之入滅在宋雲渡天竺前後，忽滑谷快天根據《釋氏通鑒》、《釋氏稽古略》、《佛祖統紀》推定宋雲往年西天求經當在魏正光三年(522)。
- 3、慧可在達摩滅後揚化於鄴，此在東魏天平初，為梁之中大通六年，當公元 534 年。

¹⁰ 參考曲大成著：〈菩提達摩生平研究〉，《正觀》第 7 期(1998 年 12 月)，頁 7-62。

¹¹ 關口真大著：《達磨の研究》，頁 48。

¹² 〔宋〕普濟集：《五燈會元》，收入河村照孝編集《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不著月份)，冊 80，號 1565，卷 1，頁 42c。此說參考黃連忠著：〈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及與梁武帝對話式演變〉，《圓光佛學學報》第 31 期(2018 年 6 月)，頁 1-34。

4、根據慧可的資料，推定達摩圓寂必在東魏天平元年（534），即梁中大通六年或其前。¹³

基於以上的資料，忽滑谷快天認為：少林寺在 497 年建立，因此，達摩來華應在 497 年之後，時間上應落在公元 502 年成立的梁朝。但是，根據忽滑谷快天所列舉的資料，達摩圓寂的年代顯然有兩種說法，第二條資料指向 522 年，第四條資料指向 534 年，因此，忽滑谷快天說達摩圓寂時間在「梁中大通六年或其前」，大概就是為了兼容兩種說法的，但是，兩種說法的時間相差 12 年，其實很難並容，不過，忽滑谷快天似乎是比較傾向採信達摩圓寂在公元 534 年的。而慧可在揚化鄴都之前，曾追隨達摩修學六年，也就是說慧可應在公元 528 年師事達摩，不過，528 年已經是梁大通二年，而不是普通七年了，所以，忽滑谷快天只能說「慧可從學達磨六載，從學之前後亦當經過不少年月，故《傳燈錄》所謂九年面壁之說亦足信憑。達磨遷化之後，慧可若即揚化，則達磨入寂為梁中大通六年，其東來為普通七年。……《傳燈》以達磨東來為普通八年，近於事實」。¹⁴

由於《續高僧傳》、《楞伽師資記》等早期文獻並沒有達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記載；且達摩先到中國，待少林寺建成之後再入住，也未嘗不可。因此，如果認為達摩來華不可能早於少林寺建成（497）的時間，可能還需要其他的佐證。至於以慧可揚化鄴都的年代往上推六年，以此推定達摩來華的時間，這是論證普通七年或八年來華說非常有力量的證據，但可惜忽滑谷快天並沒有列出他所根據的文獻資料，我將在下面「以慧可遇達摩的時間推定達摩來華時間」一節，再加以詳論。

四、達摩大師來華時間之二：

梁普通八年（527）來華說

（一）梁普通八年來華說始見於《寶林傳》

有關達摩來華的時間，不見於《續高僧傳》（645）、《楞伽師資記》（708）、敦煌本《壇經》（約 732-800）、《傳法寶紀》（716-732）、《曆代法寶記》（774）等早期文獻，而最早見於《寶林傳》（801）：

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學通三藏，尤功定業，天竺相承此三昧是如來密意也。達摩既得法已，並受法偈，住于彼國六十七歲，說法

¹³ 見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月），頁 74-75。

¹⁴ 見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思想史》，頁 73-75。

化導而演一乘，接六部眾。如是神力，宿命、他心，廣作佛事，救于大眾。時現定力，即入三昧，觀震旦眾生，有大乘性，與彼緣熟而可堪化。先辭師影，後別於王而告之言：欲往東土。……經于三載，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聞奏梁帝，梁帝敕下，詔赴京師。師取十月一日而赴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¹⁵

若對照道宣的《續高僧傳》，可見《寶林傳》增加了很多達摩的故事，如在天竺行化六十七年之後來華、行程歷經三載、廣州刺史蕭昂出迎、到達梁土的日期等，都是首見於《寶林傳》的記事。後來《祖堂集》、《景德傳燈錄》均採其說。

對於普通八年（527）來華說，宋代契嵩已經提出質疑。在近代的學界討論中，其中力主普通八年來華說，且能羅列證據，考證嚴謹的，可以孫述圻先生為代表。

（二）達摩與永寧寺

支持達摩在普通八年來華的證據，是《洛陽伽藍記》有關達摩遊永寧寺的記載，早期注意到永寧寺這條資料的是胡適先生，不過，胡先生引用這條資料，本來是作為否定「普通八年來華說」而使用的，胡適先生在〈菩提達摩考〉一文中，引用了這一條資料，證明菩提達摩應該在西元 516 年至 526 年之間，就到了北魏：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磨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¹⁶

永寧寺是在熙平元年（516）所建，至孝昌二年（526）剎上寶瓶被大風吹落，之後，在建義元年（528）和二年（529），爾朱榮和北海王元顥曾分別駐兵於永寧寺。到了永熙三年（534）全寺被大火燒毀。因此，胡適先生認為 516-526 年是永寧寺的全盛時期，達摩應該是在 516-526 之間到洛陽，因此，不可能是在梁普通八年（527）才到廣州的。

胡適先生提出永寧寺的資料，本來是要否定普通八年來華說的，但是，這條資料，在後來學界的論討中，卻變成了證明達摩在普通八年前後來華的最有力的

¹⁵ [唐]智炬著：《寶林傳》，收於柳田聖山主編：《禪學叢書（五）》（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 年 10 月），據宋藏貴珍影印，頁 132。

¹⁶ [元魏]楊衒之著：《洛陽伽藍記》，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1，號 2092，卷 1，頁 999c-1000b。

證據。1984 年孫述圻先生發表了〈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一文，力主梁普通八年前後來華說，由於孫文羅列頗多文獻佐證，在學術界引起不少回響。而其中最有力的證據，竟然是永寧寺的資料。

孫述圻認為永寧寺寶瓶在孝昌二年（526）被大風吹落，之後又重新修建，而爾朱榮和北海王元顥雖然曾短暫駐兵永寧寺，但是，對永寧寺並無破壞。¹⁷因此，達摩遊永寧寺的時間下限應該是 534 年永寧寺被燒毀之前，而不應該是 526 年。這樣，傳統所說達摩在普通八年（527）來華，後來往魏，時間上完全吻合。

18

永寧寺全盛時期應該從 516 到 534 年被燒毀止，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任何有關這一條證據的有力反駁。王榮國補充了這個說明，認為神龜二年（519）秋，永寧寺塔尚未完全竣工，胡適將熙平元年（516）視為寺塔建好的年代是缺乏根據的，並且認為胡適把寺上寶瓶被大風吹落為永寧寺衰落標志也有欠妥當。爾朱榮、元顥分別占用了永寧寺兩個月，但是，僧人在寺內的日常活動和寺院建築都沒有受到影響，事情過去之後，永寧寺又恢復了昔日的富貴氣象。因此，達摩遊永寧寺的時間應該在 519-534 年之間。¹⁹

不過，我認為即使把達摩遊永寧寺的時間下限推遲到 519-534 年，也只能證明達摩最晚在 534 年以前已經到達北魏，卻不能證明他就是在普通八年來華。他可以在普通八年以前的任何一年來華，也可以在普通八年以後、534 年以前來華。像黃連忠就根據《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的資料和高麗藏版的唐道宣《續高僧傳》推定達摩來華的時間應該在梁普通元年（520）以前（詳見下文），而非普通八年（527）。²⁰運用同一條資料，時間足足推前了七年，可見，永寧寺這一條資料的時間跨度相當大，從 519 年至 534 年，有 15 年之久，因此，要推定達摩在普通八年來華，仍然需要有其他證據。

（三）以慧可遇達摩的時間推定達摩來華時間

支持達摩在普通八年前來華的另一個證據是慧可的資料，根據《續高僧傳》·

¹⁷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卷 1：「孝昌二年，大風撥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為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其焰相續經餘三月」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0，號 2060，卷 1，頁 428c。

¹⁸ 孫述圻著：〈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三期（1984 年 8 月），頁 98-106。

¹⁹ 王榮國著：〈菩提達摩來華事跡考——兼與胡適、孫述圻先生對話〉，《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三期（2006 年 9 月），頁 30-38。

²⁰ 黃連忠著：〈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及與梁武帝對話式演變〉，《圓光佛學學報》第 31 期（2018 年 6 月），頁 1-34。

釋慧可傳》所說慧可年四十遇菩提達摩，即奉以為師。²¹ 孫述圻認為慧可生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登四十」恰好是 526 年，他在這一年遇到菩提達摩「游化嵩洛」，並「一見悅之」，這正好與菩提達摩在梁武帝普通年間、公元 526 年前後，取道廣州經建康渡江入魏，以及拜謁永寧寺的時間完全吻合。

一般有關慧可生卒年的推定，是根據史傳中有關慧可示寂於隋開皇十三年（593）的記載，如《景德傳燈錄·慧可傳》說：

師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²²

但是，慧可示寂之年，不見於《續高僧傳》、《北山錄》等唐代的文獻，最早見於宋代的《景德傳燈錄》（1004），其後，《傳法正宗記》、《五燈會元》、《佛祖統紀》等，均祖述其說。但是，《景德傳燈錄》的撰述年代，距離隋開皇十三年（593）已 400 多年，如果距離慧可活動年代五、六十年的道宣，都無法確定慧可的生卒年代，《景德傳燈錄》又為何如此清楚知道慧可示寂的時間呢？這不能不讓人產生疑問，所以，關口真大說：如果慧可的年壽變得清楚的話，從「年四十遇到達摩」的記錄，可以明確知道達摩在北方的時間點，但是，慧可示寂和年壽都是從遙遠的後世流傳下來，《續高僧傳》完全沒有記錄。因此，如果根據慧可的年紀來推論達摩到達北方的時間，是要面對很多不確定性的。我在此提出《續高僧傳·釋慧可傳》的另一條資料，對達摩在北方活動的時間，應該會有比較明晰的提示：

釋僧可，一名慧可，……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以為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祕苑。²³

天平是東魏孝靜帝的年號，天平初大概是西元 534-535 年之間，天平初慧可到了北方新鄴去弘法，往上推六年，大概是 528-529 年之間，這是慧可拜達摩為師的時間，因此，達摩最晚在 528-529 年之間，就已經到北方去了。這條資料可以作為支持達摩於梁普通七年和八年來華的有力證據，忽滑谷快天已經提及這一觀點，只是沒有舉出所根據的資料，我在此特別提出來作為補充。

不過，528-529 年是魏孝莊帝永安的年號，在梁朝則是大通年間，已經不是普通年間了。當然，如果根據這條資料，推定達摩來華時間在普通七年或八年，似乎

²¹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釋僧可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0，號 2060，卷 16，頁 551c-552a。

²² 〔宋〕道原著：《景德傳燈錄·釋慧可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號 2076，卷 3，頁 221a。

²³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釋僧可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0，號 2060，卷 16，頁 551c-552a。

也並無不可。因為 528-529 是達摩到達北方最晚的時間，但是，卻不能證明他最早何時來華？達摩大可以在 529 年或之前的時間來華，後來往北方傳教，在魏活動兩、三年之後，才遇到慧可也是可以的。

五、達摩大師來華時間之三：

梁普通元年（520）來華說

（一）《傳法正宗記》對普通八年來華說的質疑

梁普通八年來華說，契嵩在《傳法正宗記》（1061）中，已經提出懷疑：

《寶林傳》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過魏，當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并非明帝年號。又曰：達磨滅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祇十二歲，即無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獸之歲。其歲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過魏。即達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歲數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²⁴

契嵩認為達摩來華不應該定為普通八年的理由有三點：（1）《寶林傳》說：達摩在普通八年來華，同年往北過魏，正當是明帝太和十年。但是，契嵩查考史籍，發現太和並不是魏孝明帝的年號。（2）《寶林傳》又說：達摩滅度時間在太和十九年，但是，孝明帝在位只有十二年，所以沒有太和十九年。（3）如果以丁未年（526）來推算，加上九年面壁的時間，那麼，達摩滅度應該在 535 年，那時孝明帝已經駕崩。綜合以上三點，契嵩認為：如果以普通八年（527）來華，時間上並不吻合，如果是普通元年（520）來華，時間上是比較吻合的，而他所根據的是年輕時，有長老耆宿跟他說曾經看到《古祖圖》引〔梁〕寶唱《續法記》所載，謂達摩至梁，是在普通元年九月。²⁵《寶林傳》首先明確地說出達摩來華的時間在梁普通八年，而《傳法正宗記》則最早對達摩來華時間加以考證，提出梁普通元年來華說。但是，契嵩對於普通八年說也不敢貿然刪削，而是同時並存在《傳法正宗記》中。

《傳法正宗記》之後，〔宋〕睦庵善卿著《祖庭事苑》（約 1088-1108），已經採取普通元年來華說，並補充了一條論據：

²⁴ 〔宋〕契嵩編：《傳法正宗記》，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1，號 2078，卷 5，頁 744b。

²⁵ 「契嵩少聞耆宿云。嘗見古祖圖引梁寶唱續法記所載。達磨至梁。當普通元年九月也。」〔宋〕契嵩編：《傳法正宗記》，冊 51，號 2078，卷 5，頁 744b。

《寶林》諸書皆云普通八年……史書普通但至七年。皇祐長曆甲子推則有八年，今檢《南史》有八年，其年三月甲戌改大通。達摩九月至，以達摩至時已無八年。²⁶

梁普通八年在三月就已經改年號為大通，因此，達摩如果真的是九月到廣州的話，那麼年號應該是大通元年，而不是普通八年。總之，《傳法正宗記》之後，如《嘉泰普燈錄》（1204）、《歷朝釋氏資鑑》（1336）、《五燈全書》（1697）等，都採取了普通元年來華說，這類禪宗史籍還有不少，不能一一羅列。

（二）廣州刺史蕭昂以達摩事奏梁武帝

主張達摩普通元年來華的另一個重要證據是廣州刺史蕭昂以達摩事向梁武帝上奏，達摩因而與梁武帝會面，不過，這件事的時間，《傳法正宗記》是有所懷疑的：

傳燈錄諸家舊說並云：達磨來梁，在普通八年。……又皆稱：蕭昂以達磨事奏。及考昂傳，不見其為廣州刺史，唯昂姪蕭勵，當時嘗作此州刺史。恐昔傳錄者，誤以勵為昂耳。²⁷

《傳法正宗記》查考史傳，不見蕭昂當廣州刺史的記載，只見到昂姪蕭勵當時曾作廣州刺史，因此，對這條記載頗有存疑。但是，劉學智、黃連忠均認為契嵩此說失誤，劉學智說：

考之《梁書》，蕭昂為蕭景三弟，普通元年前後確實為廣州刺史，證據有二：一是《梁書》卷二四《蕭景傳》附《蕭昂傳》明謂「（昂）天監初，景遷司徒右長史……復以輕車將軍出為廣州刺史。普通二年，為散騎常侍。……故言以刺史身份奏達磨事發生在普通初（普通二年前，決不可能是普通八年）之說大致不誤。²⁸

黃連忠根據劉學智的資料，更細緻地定位蕭昂擔任廣州刺史的時間，可能在天監年間（502-519）至普通二年（521）初。在普通二年之後至普通七年（526）乃至大通元年（527），蕭昂已經轉任其他官職，故「普通八年」已經不可能擔任廣州

²⁶ 〔宋〕善卿編：《祖庭事苑》，收入河村照孝編集《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冊64，號1261，卷2，頁334a。

²⁷ 〔宋〕契嵩編：《傳法正宗記》，冊51，號2078，卷5，頁742b。

²⁸ 劉學智著：〈菩提達磨來華年代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4期（2005年7月），頁101-107。

刺史了。²⁹

但是，蕭昂在普通元年（520）在任廣州刺史是一回事，蕭昂是否引薦達摩見梁武帝又是另外一回事。今查早期僧傳，對於此事或可以釐清一點眉目。蕭昂與佛教僧侶互動的情況，在《續高僧傳·釋僧旻傳》中有過這樣一則記載：

釋僧旻，……七歲出家……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臥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³⁰

有關蕭昂的記事，《續高僧傳》僅此一見。僧旻只是一德高望重，隱居虎丘的僧人，他與蕭昂的逸事，尚且見於《續高僧傳》的記載。如果蕭昂確實曾經向梁武帝引薦達摩，為何在《續高僧傳》中完全沒有記載呢？在古代社會中，一介平民能夠得到帝王詔見，是人生中非常光榮的經驗，今查《續高僧傳》，曾獲帝王詔見的高僧，代表此高僧的學行品德備受推崇，即使高僧推辭不就，或是在與帝王的互動中，意見不合，道宣也都詳加記錄。³¹如果梁武帝曾經接見過達摩，那麼，如此大事何故不見於《續高僧傳》的記述呢？因此，即使能證明蕭昂在天監初至普通二年之間曾經當過廣州刺史，也未必能證實蕭昂曾經引薦達摩見梁武帝。蕭昂向梁武帝引薦達摩一事，並不見於《續高僧傳》的記載，而最早出現於《寶林傳》。《寶林傳》比《續高僧傳》晚出 150 年，而且記事多缺乏嚴格求證，因此，此事的可信度，就不免讓人產生疑慮了。

六、達摩大師來華時間之四：

劉宋（479）以前來華說

²⁹ 黃連忠著：〈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及與梁武帝對話式演變〉，《圓光佛學學報》第 31 期（2018 年 6 月），頁 1-34。

³⁰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釋僧旻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0，號 2060，卷 5，頁 461c、463a。

³¹ 「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網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匿然投筆。後以疎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唐〕道宣撰：《續高僧傳·釋智藏傳》，冊 50，號 2060，卷 5，頁 466b。〔唐〕道宣撰：《續高僧傳·釋僧旻傳》卷 16：「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見〔唐〕道宣撰：《續高僧傳·釋僧旻傳》，冊 50，號 2060，卷 16，頁 554a。

（一）初達宋境南越

在近代有關達摩來華時間的討論上，最具震撼性、引發最多論辯的，莫過於胡適先生提出的劉宋以前來華說。³²胡適先生根據《續高僧傳》推斷達摩來中國時還在宋亡以前，他說：

我假定菩提達摩到中國時在劉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達摩來時至遲不得在四七九以後。我的根據只是道宣僧傳中「初達宋境南越」一語。³³

宋亡在西曆 479 年，若達摩在劉宋就到達中國，那麼一切梁朝來華說，包括普通七年、普通八年（526、527）或普通元年（520）之說都變得不可能。胡適的發現，對學術界的影響很大，其後，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也採取劉宋時期來華說：「唐代時晚出禪宗史記，所敘達磨平生不可盡信。……惟今日所存最可據之菩提達磨史記有二：一為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所載，一為道宣《續僧傳》之《菩提達磨傳》。……其來中國，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據此可知達磨於宋時至中國。」³⁴不過，對於胡適先生持論的證據，仍有學者不以為然。

對於「宋境南越」一語的解讀，是考證達摩來華時間的關鍵。胡適把「宋境」解讀成劉宋的國境，這樣的解讀是「時間+地域」的概念。孫述圻不同意胡適的解讀。他認為「宋境」是一個相對的地域概念，道宣所說的「南越」是沿用舊名的泛指，「宋境」也同樣是一種泛指，這句話等於說：達摩起初抵達中國南方境內，也就是說「宋」是統稱五至六世紀的中國南方政權，絕不能據此「假定達摩於 479 年到廣州」。³⁵

關於「宋境」到底是「時間+空間」的概念？還是純粹「空間」概念？王榮國舉出了《續高僧傳》的多個語例，如〈曇鸞傳〉的「魏境」指北魏境內、〈法超傳〉的「梁境」指梁朝境內、〈那連提黎耶舍傳〉的「齊境」指北齊境內。³⁶這些語例，都是「時間+空間」的概念，因此，菩提達摩傳中「宋境」一語，應該也是「時間+空間」的語例，這樣，達摩來華的時間，就應該是在劉宋滅亡以前，

³² 近代學者大多採用此說，如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561。任繼愈著：《中國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5 月），卷 3，頁 503。杜繼文、魏道儒著：《中國禪宗通史》（臺北：龍圖騰文化，2019 年 4 月），頁 88。印順著：《中國禪宗史》，頁 3。

³³ 胡適著：〈菩提達摩考〉，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頁 302。

³⁴ 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562-563。

³⁵ 孫述圻著：〈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1984 年第 3 期（1984 年 8 月），頁 98-106。

³⁶ 王榮國著：〈菩提達摩來華事跡考——兼與胡適、孫述圻先生對話〉，《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30-38。

即 479 年以前。

不過，支持普通元年來華說的學者，如黃連忠先生，比對了韓國高麗高宗年間的《高麗藏》再刻本之《續高僧傳》，發現其原文為：「初達宋境南越，未久北度至魏」。與今本大正藏《續高僧傳·達摩傳》說：「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³⁷不同。據此，黃連忠認為達摩應該是來華後不久（未久）即北度至魏，而不是後來（末又）到魏。因此，若推定達摩來華最遲在 479 年，顯然與高麗藏《續高僧傳》的「未久北度至魏」，時間上的差距在 20 年以上，更無法解釋《寶林傳》卷 8 中，提到達摩「至於廣州，刺史蕭昂出迎」之事。³⁸因為梁朝在 502 年才建立，479 年以前還沒有梁朝的存在，所以如果確定達摩是在 479 年以前來華，不久就到達中國北方，那麼，《寶林傳》所載廣州刺史蕭昂出迎並上奏梁武帝，以及達摩見梁武帝等等的記事，都變得不可能。不過，我在上文已經提到，《續高僧傳》完全沒有記載蕭昂與達摩的互動和向梁武帝引薦的事情，因此，如果以無法解釋後出的《寶林傳》「刺史蕭昂出迎」的記載，來證明大正藏《續高僧傳》「末又北度至魏」的錯誤，似乎並不是有效的證據。相反的，剛好可以證明《寶林傳》「蕭昂出迎」是後出的記事。

（二）僧副師事達摩禪師考

胡適先生在〈書菩提達摩考後〉又補充了一個證據，說：「我假定……達摩來時至遲不得在四七九以後，我的根據只是道宣僧傳中『初達宋境南越』一語。今日重讀道宣僧傳，在僧副傳中又得一個證據，傳中說僧副是太原祁縣人，『性愛定靜，……有達摩禪師，……遂從出家。齊建武年，南遊楊輦……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也。』齊建武為西曆 494-497。梁普通五年為五二四。僧副生時當四六四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有三十歲，已快離開北方了。故依據傳文，他從摩受學，當在二十多歲時，約當蕭齊的初期，西曆 485-490 之間，其時達摩已在北方傳道了。」³⁹

對於〈僧副傳〉的這一條證據，孫述圻也有不同意見，他說：

僧副所從師的『達摩禪師』是不是菩提達摩？這顯然是一個很關重要的疑問。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緊接在《僧副傳》之後的《釋慧勝傳》……一、慧勝與僧副生卒年代、活動時間基本相同……。二、他們到建康的時間大體相近，主要播教地點完全相同……。三、兩人的籍貫雖各處南

³⁷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達摩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 12 月），冊 50，號 2060，卷 16，頁 551b。

³⁸ 黃連忠著：〈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及與梁武帝對話式演變〉，《圓光佛學學報》第 31 期（2018 年 6 月），頁 1-34。

³⁹ 胡適著：〈菩提達摩考〉，收入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頁 302-303。

北，但都遠游尋師，習尚和行止相似。四、最重要的是慧勝從「師外國禪師達摩提婆，學諸觀行」，僧副「有達摩禪師，善明觀行……遂從而出家」。二人的師傅都是善明觀行之學的外國禪師，這位禪師本名達摩提婆，簡稱達摩禪師，而他卻不是梁代來華的菩提達摩。既然如此，胡適據以推論的前提也就喪失了。⁴⁰

孫先生的說法，頗有影響力，後來杜繼文、魏道儒的《中國禪宗通史》似乎也接受這樣的看法，認為僧副所事的達摩「或另有其人」。⁴¹王榮國〈菩提達摩來華事跡考——兼與胡適、孫述圻先生對話〉一文，也贊同孫述圻的說法，認為僧副師從的「達摩禪師」，並非菩提達摩。⁴²

如果僧副和慧勝師事的禪師都是「達摩提婆」的話，那麼，胡適證明菩提達摩在劉宋以前來華的證據，就只有《續高僧傳》「初達宋境南越」一條孤證，雖然這句話也相當有份量，但畢竟只是單一證據，說服力未免大打折扣。所以，辨明僧副和慧勝師事的禪師到底是什麼人，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要考察僧副和慧勝師事的達摩禪師，到底是菩提達摩？還是達摩提婆？這還是要回到《續高僧傳》來尋找線索。檢閱《續高僧傳》全書，名字中有「達摩」的高僧，共有達摩流支、達摩笈多、菩提達摩、達摩提婆四人。四人之中，只有菩提達摩是「達摩」在後，其餘三人都是「達摩」在前，一般對僧名的省略多留名稱後半而非前半。⁴³今查《續高僧傳》，如〈達摩笈多傳〉說：「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⁴⁴，以「笈多」簡稱「達摩笈多」；〈菩提達摩傳〉說：「達摩滅化洛濱」⁴⁵，以「達摩」簡稱「菩提達摩」；〈菩提流支傳〉說：「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以「流支」簡稱「菩提流支」。⁴⁶據此，慧勝師事的達摩提婆，不會簡稱為「達摩禪師」，而會簡稱為「提婆禪師」。同理，菩提達摩可以簡稱為「達摩禪師」，卻不會簡稱為「菩提禪師」，這在〈慧可傳〉可以證明：

⁴⁰ 孫述圻著：〈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1984年8月），頁98-106。

⁴¹ 杜繼文、魏道儒著：《中國禪宗通史》（臺北：龍圖騰文化，2019年4月），頁90。

⁴² 王榮國著：〈菩提達摩來華事跡考——兼與胡適、孫述圻先生對話〉，《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2006年9月），頁30-38。

⁴³ 李利安著：〈《達摩來華年代考》質疑〉，《社會科學評論》第三期，（2007年9月）頁53-56。

⁴⁴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達摩笈多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冊50，號2060，卷2，頁435b。

⁴⁵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冊50，號2060，卷16，頁552a。

⁴⁶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菩提流支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冊50，號2060，卷1，頁428c。

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⁴⁷

慧可與菩提達摩的師徒關係是可以確定的，那麼，如果〈慧可傳〉的「達摩禪師」是指菩提達摩，那麼，〈僧副傳〉的「達摩禪師」理應也是指「菩提達摩」，而不會是「達摩提婆」。如果再對照〈僧副傳〉和〈慧勝傳〉，那麼，僧副與慧勝所師事的禪師，應該是兩個不同的人：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鑒微絕群，……而性愛定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⁴⁸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澤，閑放物表，……從外國禪師達摩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續出守南海，聞風遣請，携與同歸，因住幽栖寺。……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⁴⁹

僧副是太原祁縣人，太原祁縣位於山西省中部；而慧勝是交趾人，交趾是越南北部地區的古稱。僧副和慧勝，兩人雖然時代相近⁵⁰，但是一南一北，地隔千里，僧副是在北方拜菩提達摩為師，齊建武（494-498）年間「南遊」到達南京，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可見，僧副師事達摩禪師是在北方，而不是在南方交趾師事提婆禪師。反觀慧勝則是在南方交趾追隨外國禪師達摩提婆習禪，且在當地頗有名望，劉續出守南海時，才邀請他到南京幽栖寺，齊永明五年（487）移居鍾山延賢精舍。可見，菩提達摩在北方傳禪，達摩提婆在南方宣教。慧勝的師傅是達摩提婆，而僧副的師傅是菩提達摩，兩人師事的禪師是不同的兩個人。孫先生認為慧勝的師傅達摩提婆就是僧副的師傅，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又由於僧副在齊建武年間離開達摩到達南京，那就證明達摩在北方宣教，必然是在齊建武年間（494-498）之前。

有關僧副師事菩提達摩這件事，還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就是：一般僧傳所列的傳記順序，都參照梁慧皎《高僧傳》，分「譯經」、「義解」、「習禪」、「明律」、

⁴⁷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慧可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冊50，號2060，卷16，頁552b。

⁴⁸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釋僧副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冊50，號2060，卷16，頁550a。

⁴⁹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釋慧勝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冊50，號2060，卷16，頁550c。

⁵⁰ 慧勝生卒年代約為公元450-519年，僧副則為公元464-524年，同是五世紀五十年代至六世紀二十年代的僧人。孫述圻著：〈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1984年8月），頁98-106。

「誦經」等類，每類傳記的先後順序，體現了名僧活動時代的早晚次第關係。在《續高僧傳》卷十六「習禪」類中，首列《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第一》，次列《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第二》，而把菩提達摩列為《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摩傳第五》。這就不禁遭人質疑：道宣豈能如此胡塗，把大師倒置於他的徒弟之後，而讓其生徒榮膺僧傳習禪類的首例？⁵¹

這牽頻到《高僧傳》與《傳燈錄》的性質的差異問題，關於師徒排序的血脈傳承，是《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血脈傳》、《傳燈錄》之類禪宗史籍所特別重視的問題。但是，《續高僧傳》與《燈錄》的性質不同，道宣首先是按「譯經」、「義解」、「習禪」、「明律」、「誦經」等性質分類，至於高僧之間的師承關係，並不是《續高僧傳》所要承擔的書寫責任，因此，師徒傳承關係不一定要顯示在排序上。⁵²

除了以上的主要論點之後，還有傳大士於梁天監時見菩提達摩的論述⁵³，但是，因為所據都是宋以後的資料，如《景德傳燈錄》、《佛祖統紀》、《釋氏稽古略》（成書於元代）等，可信度不高，在當代學術界中，也很少被引述討論，本文也就不再贅論了。

七、結論

⁵¹ 孫述圻著：〈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1984年8月），頁98-106。

⁵² 在《續高僧傳》有關高僧的時代繫屬上，一般可以見到以示寂年代繫屬的狀況，如僧伽婆羅，於齊時來華，卒於梁普通五年，故道宣繫屬於梁，題為「梁揚都正觀寺扶南沙門僧伽婆羅傳一」。又拘那羅陀法師（即真諦），於梁大同十二年（546）來中國，陳太建元年（569）示寂，道宣把他繫屬於陳，題為「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五」。釋僧副於梁普通五年（525）示寂，道宣把他繫屬於梁。當然，也有些時代繫屬是有問題的，如《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一方面稱「不測於終」，一方面又題為「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摩傳」，顯然是有問題的，胡適在〈菩提達摩考·又記〉中已指出這個問題（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頁304）。又如「齊鄴中釋僧可」，傳中慧可歷經了北周武帝滅法，也就是北周已滅北齊，因此，把慧可繫屬於「齊」也是有問題的，這應該是高僧的生卒年不詳所造成的。在先後排序上，《續高僧傳》只是大概以卒年先後排序，可能因此把僧副排在達摩之前，不過，這樣的排序也不是那麼精確的，也有後死列前，先死排在後的情況，如慧勝卒於天監年間（502-519），僧副卒於梁武帝普通五年（524），《續高僧傳》卻把僧副排在慧勝之前。又如僧稠卒於北齊乾明元年（560），比慧可先圓寂，卻排列在慧可之後（當然，慧可的生卒年也是有問題的）。總之，《續高僧傳》的年代繫屬和先後排序上，都只是一個大概，並不非常精確，所幸，我們只需要了解《續高僧傳》在師資傳承上不必負上師徒傳承的書寫責任，這就足夠了。

⁵³ 劉學智：〈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4期（2005年7月），頁101-107。

有關達摩來華的時間，分別有普通七年、普通八年、普通元年和劉宋以前來華四個說法，四種說法都各有證據支持，經上文的討論，簡單總結如下：

一、普通七年說始見於宋時的《五燈會元》，與達摩活動年代相去 700 多年，時代較接近的史傳均無此說法，因此可信度不高。但是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仍然主張此說，他的論據是達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所以，達摩來華時間應在少林寺建成（497）之後，慧可到鄴都（534）之前。但是，由於達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事，不見於早期文獻，因此，可信度仍需更多論證。

二、普通八年說首見於《寶林傳》，近代學者補充了達摩遊永寧寺的資料作為論據。胡適先生把達摩遊永寧寺的時間定為 516-526 年之間。孫述圻先生則認為 526 年永寧寺寶瓶被大風吹落，但之後又重新修建，因此，達摩遊永寧寺的時間下限應該是 534 年永寧寺被燒毀之前。王榮國認為 516 年永寧寺嚮未竣工，因此，達摩遊永寧寺的時間應定為 519-534 年之間。此外，我也為普通八年說增加了一條資料，就是慧可在天平初（534-535）離開達摩往北方新鄴，此前，他隨達摩習禪六年，可見，慧可最晚在 528-529 年之間遇到達摩。此事與達摩遊永寧寺的時間（519-534）也正好吻合。然而，不管是永寧寺或是慧可師事達摩的資料，都只能作為達摩在 519-534 年之間已經在北方活動的下限，卻不能更明確地指出是他來華的時間。

三、首先懷疑普通八年說，提出普通元年（520）說的是契嵩的《傳法正宗記》。支持普通元年說的主要證據是廣州刺史蕭昂引薦達摩見梁武帝一事。蕭昂是在普通元年任廣州刺史的，普通二年離開廣州為散騎常侍。因此，達摩來華不可能在普通八年而應該在普通元年。但是，達摩與廣州刺史蕭昂的互動，以及蕭昂引薦達摩晉見梁武帝的事情，完全不見於《續高僧傳》的隻字片言，而最早見於《寶林傳》（成書在 801 年），《寶林傳》比《續高僧傳》晚出 156 年，因此，這一條證據的可信度就顯得非常薄弱。

四、力主劉宋以前來華說的是胡適先生，他主要的根據是《續高僧傳》「初達宋境南越」一語。雖然孫述圻認為「宋境」只是五六世紀中國南方政權的統稱，不過，根據王榮國對《續高僧傳》用語實例的研究，「宋境」應該是指「時間+空間」的概念，即劉宋國境。

劉宋以前來華說的另一條證據是《續高僧傳·僧副傳》，胡適認為：僧副是達摩的弟子，他在齊建武年（494-497）拜別達摩，南遊南京，在梁普通五年去世。也就是說蕭齊初期，達摩已經在北方傳道了。對於這一條證據，孫述圻根據《釋慧勝傳》認為僧副和慧勝師事的禪師是達摩提婆，簡稱達摩禪師，而不是菩提達摩。對於這條資料的質疑，讓胡適「初達宋境南越」的資料變成孤證，說服力大打折扣。

我查考了《續高僧傳》〈達摩流支傳〉、〈達摩笈多傳〉、〈菩提達摩傳〉和〈達摩提婆傳〉，發現達摩流支簡稱流支，達摩笈多簡稱笈多，同理，達摩提婆

應該簡稱提婆而非簡稱達摩，而四人中唯獨菩提達摩可以簡稱達摩。再對照〈釋僧副傳〉和〈釋慧勝傳〉，兩人到鍾山之前，僧副活動於中國北方，慧勝活動於中國南方的交趾，僧副絕無可能拜達摩提婆為師。因此，他們兩人師事的禪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僧副師事菩提達摩，慧勝師事達摩提婆。確定了達摩與僧副的師徒關係，而僧副離開達摩的時間在建武年間（494-497），這是確定的，這樣便能更進一步確認劉宋前來華說的可信性。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元魏〕楊衒之著：《洛陽伽藍記》，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第51冊第2092號。
- 〔唐〕智炬著：《寶林傳》，收於柳田聖山主編：《禪學叢書（五）》（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年不著月份，據宋藏貴珍影印）。
- 〔唐〕道宣著：《續高僧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第50冊，第2060號。
- 〔宋〕契嵩編：《傳法正宗記》，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第51冊，第2078號。
- 〔宋〕善卿編：《祖庭事苑》，收入河村照孝編集《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第64冊，第1261號。
- 〔宋〕普濟集：《五燈會元》，收入河村照孝編集《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第80冊，第1565號。
- 〔宋〕道原著：《景德傳燈錄》，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12月），第51冊，第2076號。

二、近人論著

- 王榮國著：〈菩提達摩來華事跡考——兼與胡適、孫述圻先生對話〉，《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6年9月），頁30-38。
- 任繼愈著：《中國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5月）。
- 印順著：《中國禪宗史》（臺北：正聞出版社，1975年2月）。
- 曲大成著：〈菩提達摩生平研究〉，《正觀》第7期（1998年12月），頁7-62。
- 李利安著：〈《達摩來華年代考》質疑〉，《社會科學評論》第3期（2007年9月），頁53-56。
- 杜繼文、魏道儒著：《中國禪宗通史》（臺北：龍圖騰文化，2019年4月）。
- 孫述圻著：〈菩提達摩與梁武帝——六朝佛教史上的一件疑案〉，《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1984年8月），頁98-106。

- 張國一著：《唐代禪宗心性思想》（臺北：法鼓山文教基金會，2004年4月）。
- 陳盛港著：〈再論獨孤沛之〈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7期（2002年7月），頁115-146。
- 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
- 黃連忠著：〈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及與梁武帝對話式演變〉，《圓光佛學學報》第31期（2018年6月），頁1-34。
- 楊曾文著：〈《六祖壇經》諸本的演變和慧能的禪法思想〉，《中國文化》第6期（1992年6月），頁24-37。
- 劉學智著：〈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4期（2005年7月），頁101-107。
- 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 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6月）。
- 關口真大著：《達摩大師の研究》（東京：春秋社，昭和44年（1969年）不著月份）。
- 關口真大著：《達磨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昭和43年（1968年）不著月份）。

Analysis on When Master Dharma Came to China—— A Re-discussion on “Theory of Arrival at China during Liu Song Dynasty” by Mr. Hu Shih

Law Ling-Pei*

Abstract

Master Dharma was considered the vanguard of Zen in China. All who wish to enter the sanctum of Zen must know the master who brought the Zen from India. However,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modern studies as well as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all we can affirm is that he's a true figure in history; some other legends about him are hardly reliable. The time point of his arrival in China alone is divided into four opinions:

I. Theory of Arrival in the 7th Year of Putong during Liang Dynasty (526 A.D.);
2.Theory of Arrival in the 8th Year of Putong during Liang Dynasty (527 A.D.);3.
Theory of Arrival in the 1st Year of Putong during Liang Dynasty (520 A.D.);
4.Theory of Arrival before Liu Song Dynasty (479 A.D.)

The researcher has organized the academic opinions regarding the four theories. The theory of arrival in the 7th or 8th Year of Putong during Liang Dynasty could only be seen as the lower limit; whether he came to China in this exact point couldn't be confirmed. The data of theory of arrival in the 1st Year of Putong during Liang Dynasty were found in later periods, and no earlier records are discovered, which makes it unreliable. The most reliable source is the theory of arrival before Liu Song Dynasty proposed by Mr. Hu Shih, who based his theory on the words of “firstl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rrived at Vietnam within the realm of Song” in *Second Chronicles of Master Monks - Bodhi Dharma*, as well as the records of apprentice of the master. However, such records is debatable by other scholars, who considered the “Dharma” in this chronicle was Dharma Deva instead of Bodhi Dharma, and so his argument could only focus on the words of “firstly arrived at Vietnam within the realm of Song” alone. Based on the data of *Second Chronicles of Master Monks*, the researcher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Zen master in the records was indeed Bodhi Dharma, bringing a more solid evidence for the theory of his arrival before Liu Song Dynasty.

Keywords: Zen history, Biographies of monks, Bodhi Dharma, Arrival at China, Hu Shih

